

增值税分成、财政激励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

——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彭 飞 蔡 靖 吴华清*

摘要：优化财政分配格局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探究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差异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变化，本文以 2016 年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作为地方财政激励的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0 ~ 2019 年市县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激励能显著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且这一效应具有持续性特征。对于改革前经济发展不平衡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财政激励发挥着“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城市，财政激励效应更加明显。机制证据表明，财政激励通过加强税收竞争和扩大政府投资两种渠道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激励推进了城市共同富裕发展进程，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改善的主要表现。本文不仅拓展了税收分成的经济效应研究，而且从财政激励角度廓清了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成因和内在机制。本文结论为新发展阶段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供了经验参考和决策方向。

关键词：增值税分成 财政激励 经济发展不平衡 税收竞争 政府投资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894(2023)03-0070-21

DOI:10.13653/j.cnki.jqte.2023.03.002

一、引 言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现实挑战，特别是对管辖范围内地理区域较大的国家（Shankar 和 Shah，2003）。循环累积因果理论（Cumulative Causation Theory）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禀赋优势会使得生产要素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并且不断积累有利因素形成回流效应，从而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对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也随之产生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难题。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增速加快，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实际人均 GDP 之比由 2000 年的 3.08 下降到 2020 年的 2.67，不过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

* 彭飞，教授，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pengfeihfut@163.com；蔡靖，研究生，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2641478648@qq.com；吴华清（通讯作者），教授，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wuhuaqing@hfut.edu.cn。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730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6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80303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JZ2021HGTB0067）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题依然较为突出。与此同时,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还呈现出新特点,南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呈扩大态势,南北地区实际人均 GDP 之比由 2000 年的 1.04 扩大至 2020 年的 1.21^①。因此,着力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难题对于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深远意义。

为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强调以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问题,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战略指向性和精准性更加明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相继实施,健全区域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已成为“十四五”规划时期的重要建设任务。基于此,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区域战略和经济体制,破除原有发展模式弊端,以更平衡、更充分的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并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已成为新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课题。

经济发展不平衡一直是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经济体之间所建立起的贸易和货币体系共同形成了全球经济复杂网络,虽然实现了资源与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循环,但也带来了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Komarova 等(2021)比较了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发现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小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Shankar 和 Shah(2003)比较了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演变状况,发现无论是单一国家还是联邦国家,只有消除要素流动障碍、保障基本服务供给,才能更好地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以中国为对象,随着区域发展战略不断推进,整体上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有所缓和(陈梦根和张帅,2020)。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成与特征往往源于诸多复杂的市场经济因素,近期研究从政策与制度角度探讨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Qiao 等,2008; Kyriacou 等,2017)。在中国财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税收分成改革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经济转轨时期,财政体制改革注重提升中央与地方经济发展积极性,以及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协调发展。在当前“大共享税”的财税体制背景下,财政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原则已调整为理顺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划分关系,科学确定共享税分享方式及比例,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已明确将优化央地财政关系放在财政体制改革的首位,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研究表明,央地间财政关系调整关系到地方政府可支配性收入及其预算约束,进而关系到地方政府行为和政策选择(Weingast,2009)。税收分成改革作为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与财政激励的核心内容(吕冰洋和陈怡心,2022),既可能激发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促进资本要素流动和扩散,增强政府投资,进而提升地区经济绩效与公共产品配置能力(Lv 等,2020; 谢贞发和张佼雨,2021),又可能因税收竞争加剧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Wilson,1999)。因此,财政激励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究竟发挥着促进作用还是抑制效应,对此进行严谨的实证评估对于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地区间均

^①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变化,本文绘制了 2000~2020 年中国东西部地区和南北地区人均 GDP 比值变化图。具体参见附图 1。本文附录详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网站,下同。

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为了降低“营改增”税种平移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税收收入压力，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由75:25调整为50:50（国发〔2016〕26号），这就为准确识别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提供了难得的政策窗口。基于此，本文基于增值税分成改革对不同城市的财政激励差异，利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激励显著改善了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且这一效应具有持续性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改革前经济发展不平衡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财政激励发挥着“雪中送炭”的作用，并且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城市，财政激励效应更加明显。机制证据表明，增值税分成改革提高了地方税收分成比例，激励了地方政府加强税收竞争，加快了资本流动和扩散，提升了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政府投资水平，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均衡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改善效应主要表现为财政激励推进了共同富裕发展进程，而不是导致了“共同贫穷”。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文从地方政府财政激励角度探讨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成因，拓展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视角。现有文献通常从经济与产业结构、要素流动和空间集聚、资本与效率等市场因素角度进行研究，而本文立足于财税体制改革实践，揭示了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这是本文在研究选题上的创新之处。其次，丰富了所得税分成和增值税分成的经济效应研究。已有研究大多基于所得税分成改革，关注“压力型”财政激励对地方政府税费征管行为的反应以及对跨地区投资等企业行为的影响，而本文聚焦于增值税分成改革重点评估正向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均衡发展的作用效果，不仅廓清了财政激励与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之间的理论逻辑，而且延伸了税收分成领域的实证方向。最后，本文通过考察财政激励的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内在机制，为新发展阶段健全财政体制改革、平衡不同层级政府财权与事权分配以及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通过优化财力分配格局不断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调动地方经济发展积极性已成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分税制框架下，政府间财政关系主要集中于税权和事权的分配，而税权分配设计又集中在税收共享机制设计（刘勇政等，2021）。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间税收划分逐步由财政包干制下的分成合同和定额合同为主向以分税合同为主转变（吕冰洋和陈怡心，2022）。在新发展阶段前景下，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央地财政关系已上升为“十四五”时期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建设任务。

为了优化财政收入分配格局，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体制机制优势，中国进行了多次税收分成改革实践。在所得税分成改革方面，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限制地方保护主义，弱化市场分割行为，减缓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趋势，实现共同富裕，国务院发布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国发〔2001〕37号），规定以2001年地方实际所得税收入为基数，将所得税由地方税调整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2002年中央与地方的增量分成比例为50:50，2003年及以后按照60:40划分。在增值税分成改革方面，为了减轻税制成本，激发实体经济活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营改增”试点改革规定（财预〔2012〕367号、财预〔2013〕275号）试点期间收入归属保持不变，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

后仍全部归属试点地区。为了调动地方发展经济、培育税源的积极性，缩小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6号）规定，适当提高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由25%调整为50%，以2014年为基数核定中央返还和地方上缴数额。为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能，《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国发〔2019〕21号）要求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①。

（二）理论分析

健全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体制不仅是调动地方经济发展积极性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剖析财政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吕冰洋和陈怡心，2022）。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发展历程表明，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央根据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侧重点不同，对财政体制设计的总体要求也不同，进而形成相应的财政体制安排。整体来看，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一直都偏重于财权的划分，主要原因在于财权划分关系到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对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稳定的财政收入能够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供财力支持。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长又是各级政府绩效考核、政治晋升的重要条件（吕冰洋和陈怡心，2022）。因此，增加财政收入必然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目标和内在动机。

税收分成作为分税制改革的核心，不仅关乎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权财力，更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谢贞发和张佼雨，2021）。其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划分较为统一，而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表现形式较为复杂，各市县所获得的税收收入留存比例在时间、空间上的差异性特征，实质上构成了弹性的税收分成系统（吕冰洋和陈怡心，2022）。在政府间弹性税收分配制度下，各级政府共同承担财政风险和收益，从而有助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发挥财政体制的内在激励作用。在增值税分成改革背景下，税收分成下移实质上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动机，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晋升双重目标，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加强税收竞争、扩大政府投资两种渠道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一方面，税收竞争作为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工具，对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空间均衡具有重要作用。早期税收竞争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出于对流动性税基的竞争会降低资本税率，弱化公共支出效率，加剧资源配置不均，进而扩大地区间发展差距（Wilson，1999）。与上述理论观点不同，近期研究表明，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还具有积极效应，认为税收竞争能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要素配置扭曲，增加生产效率较低地区的劳动力供给，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Lipato 和 Weichenrieder，2015）。Han 等（2018）指出，当地区资本流动性较高且初始差距较为有限时，税收竞争有助于改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Tsai（2019）基于核心—外围模型探讨了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认为中心地区利用均衡税率和税收收入优势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对外围地区具有更强的溢出效应。Hindriks 和 Nishimura（2021）进一步发现，居于领导地位的高税收国家提高了税收竞争下的整体均衡税率，使得处于税收追随地位的低税收国家增加了更多税收收入，从而缩小了国家间税收收入差距。

由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焦点在于对资本要素的需求，而资本要素的合理有效流动又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Partridge 等，2015），因此税收竞争可能通过跨地区资本流动作用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有动机运用各种

^① 为了清晰观测增值税分成改革对地方财政收入及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本文报告了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增值税收入占比变化情况。具体参见附图2。

手段吸引外来资本流入，其中最为倚重的手段就是税收竞争。然而，地区间禀赋、资本税率弹性等差异使得税收竞争过程中地区实际税率出现分化（杨龙见和尹恒，2014），故而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形成较大差异，为加速资本跨地区流动创造了现实条件（王凤荣和苗妙，2015）。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资本收益边际递减作用下，资本将从相对充裕的地区流向相对匮乏的地区，从而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这是因为资本成本对经济规模较大的地区税率变化较不敏感，在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更有动机通过降低税率获取资本流动竞争优势（Azémar等，2020），使得资本要素更加偏向于流向经济规模较小的外围城市（Lee和Choe，2012）。因此，在现行经济体制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税收竞争有助于打破地区间经济要素分布不均，促进经济要素的区域扩散，实现地区资源要素再配置，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罗富政和罗能生，2019）。

另一方面，政府投资是实现国家宏观调控、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政府职能作用的重要手段，既承载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受到财政自给能力的直接约束。在保持原有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分成改革提高了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地方政府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具有强烈动机扩大投资，以提高经济发展目标，实现更高的财政收益（Lv等，2020；吕冰洋和陈怡心，2022）。从投资规模角度来看，随着政府投资累积和资本深化，资本匮乏地区的资本回报率相对增加，资本需求相对上升，资本流动方向的改变将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Turnovsky，2015）。从投资结构偏向角度来看，在“财政分成制”激励下，地方政府为最大化任职期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更加偏好于短期收益较大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Jia等，2014）。作为社会先行资本的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特征，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地区间分工与协作，吸引私人资本流入，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尤其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扩展地区发展空间（Yin等，2015），促进资本要素向外围城市空间扩散（Baum-Snow等，2017），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实现中心—外围城市间技术分工与合作，提升城市间资本互补互动优势，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兰秀娟等，2021）。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核心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增值税分成改革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有助于提高税收竞争强度，扩大政府投资，改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三、实证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的核心是要检验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了更加准确地评估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不平衡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借助增值税分成改革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的准自然实验，利用不同城市受到财政激励程度的差异，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财政激励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具体而言，本文从增值税分成角度刻画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变化，有助于规避宏观指标构建可能造成的测量误差和统计口径难题。由于增值税分成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行，以2016年作为政策冲击的共同时点无法区分受到政策影响和未受到政策影响的差异，所以**本文以改革前两年（2014年）城市增值税收入占比情况识别财政激励大小，该系数越大，则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越大。**模型设计如下：

$$Inequal_{i,t} = \beta_0 + \beta_1 Incentive_i \times Post_t + \gamma X_{i,t} + \lambda_t + \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nequal_{it}$ 表示 i 城市 t 年的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 由下文式 (2) 测算得到; $Incentive_{it}$ 是财政激励强度变量, 表示 i 城市在改革前两年 (2014 年) 的城市增值税收入占该城市财政收入的比重; $Post_{it}$ 为改革年份虚拟变量, 若 t 小于 2016 年则赋值为 0, 反之则赋值为 1; X_{it} 为一组控制变量; λ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η_i 为城市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

关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主要包括绝对差异描述指标和相对差异描述指标。由于绝对差异描述指标反映了地区经济总量水平的绝对距离, 受极值的影响较大, 所以既有研究一般使用相对差异描述指标进行测度, 主要包括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等 (Shankar 和 Shah, 2003; Akita 和 Miyata, 2010; 陈梦根和张帅, 2020)。其中, 变异系数主要在时间序列维度上反映指标变化; 基尼系数虽适用于面板数据, 但侧重于因子分解; 阿特金森指数是以社会福利为基础的不平等指数, 着重于分析社会福利变化; 而泰尔指数则是通过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赋予相应权重, 进而进行不同空间尺度分析, 不仅在测算过程中不易受极端值和地区规模差异的干扰, 而且在比较不同地区的不平衡程度时也不会受到地区数量差异的影响。由于本文关注的焦点不在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来源对象, 而在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空变化。基于此, 泰尔指数可能更适用于本文的研究。具体而言, 本文借鉴 Shankar 和 Shah (2003) 的计算方法, 使用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数量构建泰尔指数, 并将研究尺度设定为地级市层面。计算公式如下:

$$Inequal_{it} = \sum_j^N y_{jit} \ln \left(\frac{y_{jit}}{p_{jit}} \right) \quad (2)$$

其中, i 表示城市, j 表示县, t 表示时间; $Inequal_{it}$ 表示 i 城市在 t 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 y_{jit} 表示 t 时期 j 县在 i 城市内的 GDP 份额; p_{jit} 表示 t 时期 j 县在 i 城市内的人口份额; N 表示 i 城市的县区数量。泰尔指数越小, 说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越低, 反之则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越高。

2. 核心解释变量

$Incentive$ 是本文的强度变量。由于增值税分成比例变化会对不同城市带来不同强度的财政激励, 并且在改革正式实施前, 各地方政府可能会预知到政策将要施行, 从而做出预期反应, 虚报增值税征收额, 从而干扰政策调整的外生性, 所以本文的强度变量与增值税分成方案的基期时间保持一致, 以 2014 城市增值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反映城市间财政激励差异。其内在逻辑在于, 在中国财政运行体制下, 税收分成变动能较好地衡量地方财政激励变化, 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具有深刻影响 (谢贞发和张佼雨, 2021), 例如政府投资、税收优惠、税收征管、财政竞争等。与此同时, 增值税分成改革虽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地方政府分成比例, 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能力不同, 地区间实际征收的增值税收入存在较大差异。因此, 改革前城市增值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越高, 改革后增值税收入留存越多, 受到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的财政激励越大。此外, $Post$ 表示增值税分成改革时间虚拟变量, 改革之前取值为 0, 改革当年及之后取值为 1。 $Incentive \times Post$ 即为关心的财政激励效应。

3. 控制变量

基于相关文献的指标设计, 在模型 (1) 中纳入了以下控制变量 X : (1) 经济发展, 使

用城市人均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表示；（2）产业结构，使用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3）对外开放，使用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4）人口规模，使用城市年末总人口取自然对数表示；（5）城镇化率，使用城镇人口占城市年末总人口比重表示；（6）人力资本，采用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城市年末总人口比重表示；（7）财政自给率，使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比表示；（8）“营改增”政策变量。考虑到本文样本区间涵盖了“营改增”试点期间，可能会干扰地方财政收入变化，故需要规避该试点政策的影响，定义城市在试点之后取值为1，试点之前取值为0。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主要使用2010~2019年中国市县经济统计数据进行研究。其中，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基于县级和市级层面地区生产总值以及人口进行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强度变量使用市级和省级层面的税收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他变量主要基于市级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由于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在行政层级及财政体制上不同于一般的市县级政府，故排除四个直辖市样本和五个计划单列市样本；（2）由于数据缺失，删除西藏地区的城市样本；（3）为了控制离群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分位和99%分位进行缩尾处理；（4）对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阅《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填补处理^①。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以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城市增值税收入占比（*Incentive*）与增值税分成改革（*Post*）交互项衡量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水平，采用式（1）实证检验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为了避免标准误低估与序列相关问题，以下回归均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Cluster*）。

表1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考察了不纳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Incentive* × *Post* 系数显著为负，初步表明增值税分成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程度越高，其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改善作用越大。第（2）列纳入了城市经济特征控制变量（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在此基础上，第（3）列纳入了城市人口特征控制变量后（人口规模、城市化和人力资本），发现交互项系数依然稳健。考虑到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所以在第（4）列纳入了地方财政特征变量（财政自给率），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与前列保持一致。由于在样本观测期间进行了“营改增”试点改革，这一税制转换使得地方政府由全额分享营业税收入调整为分享25%的增值税收入，这就降低了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进而可能干扰增值税分成改革的作用效果。基于此，第（5）列进一步纳入了“营改增”变量，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及显著性没有显著变化。经济意义表明，若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强度提高十个百分点，那么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将平均降低

^①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附表1。此外，为了揭示受增值税分成改革影响的财政激励差异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本文描绘了财政激励与改革后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散点关系。结果显示，散点拟合线向下倾斜，说明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增值税分成对城市的财政激励越大，改革后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越低。拟合关系图参见附图3。

5.72%。统计意义表明,增值税分成改革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显著改善了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理论假说得到初步验证。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ncentive \times Post$	-0.486*** (0.126)	-0.481*** (0.117)	-0.542*** (0.115)	-0.573*** (0.114)	-0.572*** (0.113)
经济发展		0.097*** (0.022)	0.089*** (0.021)	0.085*** (0.021)	0.085*** (0.021)
产业结构		0.027 (0.072)	0.070 (0.069)	0.072 (0.069)	0.073 (0.069)
对外开放		0.041** (0.019)	0.017 (0.022)	0.019 (0.022)	0.019 (0.022)
人口规模			-0.096* (0.058)	-0.095* (0.057)	-0.095* (0.057)
城市化			-0.103 (0.081)	-0.099 (0.082)	-0.100 (0.082)
人力资本			0.005 (0.005)	0.004 (0.005)	0.004 (0.005)
财政自给率				0.027** (0.012)	0.027** (0.012)
“营改增”					0.002 (0.006)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508	2434	2385	2385	2385
调整 R ² 值	0.036	0.097	0.120	0.123	0.12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 异质性分析

1. 经济发展不平衡差异

如果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水平较高,可能会对增值税分成的反应较为强烈,并由此可能会产生显著的财政激励效应。基于此,本文基于改革前的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差异进行检验。具体而言,按照改革前一年(2015年)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大小将样本划分为高中低三组,选取高低两组进行考察。表2第(1)列结果显示, $Incentive \times Post$ 变量显著为负,表明改革前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越高,增值税分成改革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越有助于改善当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第(2)列结果显示, $Incentive \times Post$ 变量不显著,意味着对改革前经济发展不平衡较低的城市而言,财政激励没有发挥显著改善效果。结果表明,对于改革前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较高的城市,财政激励发挥着“雪中送炭”的作用,能显著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促进城市经济协调发展。

2.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由于不同城市的发展起点和资源禀赋不同,增值税分成对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的反应进而对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本文根据改革前一年（2015 年）城市人均 GDP 对数值将样本划分为三组，以最高和最低的两组为对象进行检验。表 2 第（3）、（4）列结果显示，在两组回归中， $Incentive \times Post$ 均显著为负，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中，显著性及回归系数绝对值均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意味着财政激励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改善效应更为突出。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凭借较为成熟的市场条件和资本积累等优势，对政府投资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因自身基础设施、区位条件等资源禀赋条件的局限，对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公共投资驱动的依赖较强（刘勇政等，2021）。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对财政激励的反应更为敏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

3. 税收征管强度差异

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分成改革可能会对地方政府产生显著的税收征管激励。而随着税收征管强度的提高，可能会产生治理效应和成本效应。一方面，促进了“应收尽收”，能有效遏制企业偷漏税行为，降低地方政府合谋空间，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促进了“应享尽享”，征税机关的监督稽查促进了企业加强内部治理，提高了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和资金使用效率（Chung 等，2019）。基于此，较高的税收征管强度可能更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优化要素配置，推动知识与技术扩散和外溢，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借鉴既有研究的一般思路，本文使用“税柄法”测算城市税收征管强度，通过比较实际税收比率（实际税收收入/GDP）与潜在税收比率（潜在税收收入/GDP）的偏离度来反映税收征管强度^①。然后按照税收征管强度高低将样本划分为高中低三组，选取高低两组来考察在不同税收征管强度条件下，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表 2 第（5）、（6）列结果显示，增值税分成改革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显著降低了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对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城市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城市税收征管强度越高，财政激励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改善效应越明显。

表 2 异质性分析

变量	经济发展不平衡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税收征管强度差异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1)	(2)	(3)	(4)	(5)	(6)
$Incentive \times Post$	-0.684 ^{***} (0.171)	0.024 (0.056)	-0.223 [*] (0.126)	-0.697 ^{**} (0.276)	-0.659 ^{***} (0.166)	-0.195 (0.17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863	654	648	753	821	661
调整 R ² 值	0.186	0.048	0.108	0.146	0.169	0.085

注：同表 1。

① 税收征管强度的测算过程如下： $tax_{it} = \alpha + \beta_1 city_gdper_{it} + \beta_2 city_trade_{it} + \beta_3 city_p_{it} + \beta_4 city_cz2_{it} + \beta_5 city_cz3_{it} + \beta_6 city_urban_{it} + \lambda_t + \eta_i + u_{it}$ ，等式左边为实际税收收入比率，等式右边分别为人均 GDP、对外开放、人口、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率以及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通过回归可得到拟合的税收比率变量 tax_{it_est} ，进而可测算城市税收征管力度。

五、稳健性检验

(一)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假设是双重差分模型结论成立的重要前提，即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需满足基本一致的变动趋势，否则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干扰结论的可靠性。对此，本文将采用以下方法加以检验。

第一，事件分析法。通过构建增值税分成改革时点变量，估计不同年份的政策效应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图 1 所示，在分成改革之前，不同年度的政策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没有显著差异，意味着本文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设计满足对平行趋势的基本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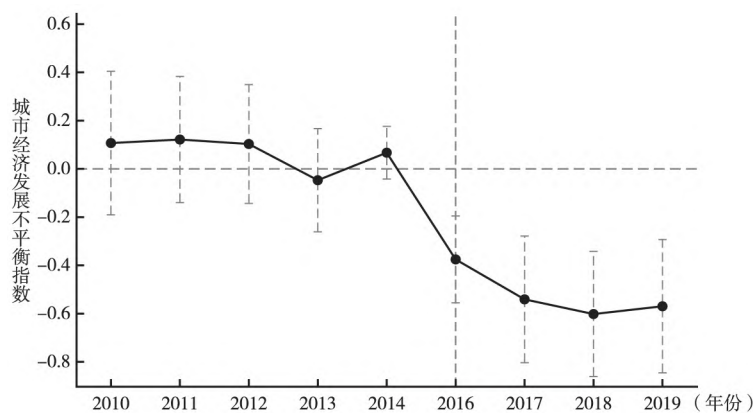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第二，改革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变化趋势检验。以增值税分成改革之前样本为研究对象，检验不同财政激励强度下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变动趋势，即将基准模型中 $Incentive \times Post$ 调整为强度变量与时间趋势变量的交互项 $Incentive \times T$ 。表 3 第 (1) 列结果显示，交互项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不同财政激励强度下的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增值税分成改革前没有显著差异，再次验证本文模型设计符合平行趋势假设。

第三，条件平行趋势检验。为了降低财政激励强度变量的趋势差异对结论的干扰，本文通过纳入财政激励强度变量与时间趋势交互项，来消除随时间变化的组间差异。第 (2) 列结果显示， $Incentive \times Post$ 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控制财政激励的时间趋势后，基准结论稳健成立。进一步地，纳入城市固定效应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以控制不同城市财政激励强度的趋势差异，第 (3) 列结果证实了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改善效果。意味着在放松平行趋势严格假设条件下，通过控制财政激励的时间趋势以及不同城市的趋势异质性后，仍然能够发现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变量	平行趋势检验		
	改革前的变化趋势检验	条件平行趋势	
	(1)	(2)	(3)
$Incentive \times Post$		-0.411 *** (0.113)	-0.390 *** (0.110)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98054027022006067>